

儒学的历史叙述与 当代重构

RUXUE DE LISHI XUSHU YU
DANGDAI CHONGGOU

景海峰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儒学的历史叙述与 当代重构

RUXUE DE LISHI XUSHU YU
DANGDAI CHONGGOU

景海峰 主编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武丛伟 崔秀军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的历史叙述与当代重构/景海峰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01-016917-0

I. ①儒… II. ①景… III. ①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2586 号

儒学的历史叙述与当代重构

RUXUE DE LISHI XUSHU YU DANGDAI CHONGGOU

景海峰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6.5

字数:94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6917-0 定价:1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项目由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前言

当代的儒学研究是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的。有义理之儒，近于哲学；有文史之儒，重在文献考据；有辞章之儒，致力艺文；也许还有经世之儒，以政法、工商为左纛。在林林总总的眼界和方式中，文献总是最基础的，材料是硬道理，所以“做”儒学，首先就是从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文字、图像、遗迹等实存物入手，已经存在的记录和构成了可叙述性的历史片段，便成为儒学话语展开的前提。在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中，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历史意识的“前在”状态是保证叙事有效性的砝码，所以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在当代的学林中便获得了天然的优位，对于传统的儒学资源来说，更是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儒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儒学史的研究，当时的一种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理解是，儒学已经成为历史，所以研究儒学就只是研究它的历史。在当代新儒家出现、新儒学兴起并为学界所关注之前，这似乎已是常识，因为所有的儒学叙事都几乎是以历史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大家对儒学的理解也主要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的渠道而得到灌注和滋养。儒学史的现代书写，在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体系土崩瓦解之后便自然展开了，作为已经“离场”的陈迹和被描述的历史对象，儒学发展的历程就成为了一部编年史，从可以考论的先秦时代一直延续到晚清。

但历史学的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像它自诩的科学宗旨那样清晰和确定，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中，对儒学历史的叙述充满了各种简约化的阐释因素，所选取编排的材料，也经过了有意识的挑拣，按照对象化的所谓“客观”要求，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现代解释。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对于儒学的角色判定和功能说明，是带有强烈的解构性和颠覆性的，社会环境中到处弥漫的政治色彩和无休止的批判活动，又使得这一编年式的叙述工作也相当的支离破碎和极其的不稳定。在种种科学方法和理论假定的前提下，历史材料的挖掘、清理、勾连和解读，以及基于现代思想观念的究元决疑，让儒学发展的叙事过程充满了已解释的内容和未解释的内容的混杂，同时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也堆

积在一起，加之各种解释系统的内容叠加和相互的融合，就使得儒学的历史叙述始终是处在一种模糊和漂移的状态。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历史学研究所追求的客观性存在着“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的危险，往往因偏执于所谓的真实性而自以为是、囿于一孔之见，其自持的确定性反倒可能会陷入到凝固化、拘泥乃至荒谬之中。历史不是板结的色块与图画，而是人的丰富精神活动的连续性累积，对于历史的理解需要当代人的“精神的当下或在场”（伽达默尔语），通过对文本等历史传承物的解读和体味，每个生命个体与过去的历史情景之具体性有所契合，以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流中。历史绝不是各种事件的简单堆积，对于历史的解释更不是僵固的、表象的描述，而是需要不断地返回到浅近的传承物的背后去，用自身的切己感知去理解和挖掘个中的意义，以获得真实的历史存在感。所以，深刻的历史研究不应只是陈述事件，对已经存在的文本做白描式的展示，而应该解读其附属的意义，在有限的文字记述和浅显易识的表象背后，捕捉和领悟到人类精神活动的内涵与真谛。这样的历史理解，不仅仅是以所谓的“客观性”为标示，也需要避免陷入僵固的简单确定性之中，其目标是重在不断的意义发掘活动和创造性的叙事过程，以启迪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换言之，诠释学叙事的历史画卷应该是灵动的、活泼泼的，并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一种内在的嵌入感，以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往来。

按照诠释学的理解，历史不仅是可叙述的，而且也是不断重构的过程，并没有一个既定的、凝固的历史。伽达默尔（H.-G.Gadamer）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①亦即历史是在理解中建构的，也是在理解中呈现的，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儒家，它的历史更应该是如此。可诠释的儒学史，其得以显现和准确把握的基本中介，即是历代儒者所留存下来的著作，通过对这些文字的阅读、体悟、理解和阐释，我们和古代人的心灵便发生了交会和碰撞，在不断的视域融合机理下，加入到“效果历史”之生成的无尽环节当中去。正像诠释学家特雷西（D.Tracy）所说的：“经典性文本透过其效应史向外延伸，最终被另一时代的另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一解释者所接受。解释者则不断向前拓展，不断穿越对经典文本的前在理解和既定期待。文本和解释者相互作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无从避免。”^①这样，所谓儒学的历史就这样呈现出来了，我们所说的儒学发展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从经典诠释来解读儒学的历程，它就不限于编年史，而可能是情景化的、模拟化的，亦即超越了事件本身的处境，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普遍性。

受哲学诠释学之“效果历史”观念的影响，当代的儒学研究已逐渐摆脱机械历史观的羁绊，而更加注重于儒学的活性与当下性，对历代儒者所存留之文本的阅读也早已超离了历史文献学的心态，不只把它们看作是过去的遗产和僵死材料，而是可以叩问、可与交谈的心灵之友，通过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来寻求人类精神持续绵延的意义，体悟和印证我们当下的实存感受。儒学研究的这一诠释学转向，使得儒学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眼界和框架中，而更多地包含了叙事与重构的意味，儒学研究也就不再仅仅是儒学史的研究了。

继2015年1月的“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又在当年的11月主办了“儒学的历史叙述与当代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议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延续性，所讨论的问题也有相当的衔接感，在探讨儒家经典诠释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到儒学的当代重建问题。出席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代表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近百人，约有80篇论文提交给会议。大会围绕着“儒学的历史叙述与当代重构”这一主题，就以下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1）儒学发展史上的相关问题；（2）有关经学史的思潮、人物、专题等研究；（3）儒家思想的现代研究方式及其学术史写作；（4）儒学在当代的发展与可能走向；（5）新时代世界格局转变过程中的儒家文明；（6）儒家传统价值与现代都市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些议题所展开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我们把会议的论文挑选出来一部分，略加修订，并且重新依照会议主题进行编排，交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景海峰

2016年暑期于深圳湾畔

① 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目 录

前 言	景海峰 1
道统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蔡方鹿 1
试论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张新民 29
中国早期“神明”观演变脉络探源	翟奎凤 48
中国学术的开端	
——《舜典》命官与官师合一的时代	张京华 61
谁之“思”? 何种“位”?	
——儒学“思不出其位”之中的“政治”与“心性”向度	陈立胜 71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哲学义诠	
——兼论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	王兴国 98
孟子的“天赋权利”思想	
——以“天爵”、“良贵”和“民意”为视点	王中江 102
孟子的精神修炼	匡 钊 118
诚于己、推诸人、达于天	
——《四书》中的“恕”、“诚”、“仁”关系新探	余树苹 141

荀子论“争”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 东方朔 152

荀学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吕文都 165

荀子伦理思想的历史向度：前后、百年和古今 邓小虎 178

儒家系统的宇宙论及其变迁

——董仲舒、张载、戴震之比较研究 冯达文 186

董仲舒“一气、感应、民主”的辩证思维 金周昌 206

“仁”的落实与“义”的调适

——以《说苑》为例 张丰乾 216

“孟轲敦素”：南朝孟学史的点睛之笔 杨海文 228

文中子易学思想研究 李 强 246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思辨性

——从伊川、朱子之学说起 杨祖汉 258

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梁 涛 280

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关系探微 刘学智 301

论宗子制是宗法思想的核心

——以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为中心 解光宇 311

南轩的理学思想 王立新 321

白沙儒学与明代文化的转向 刘兴邦 328

心学道统论

——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吴 震 338

简论《辟释氏诸妄》对佛教的批评问题 问永宁 364

“六经责我开生面”

——王夫之的哲学境界 宁新昌 375

康有为晚年新道德进化论的新经学 唐赤蓉 黄开国 387

“蜀学”五事论稿

——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舒大刚 李冬梅 403

现代儒学的架构：易学、儒学、理学与心学 成中英 423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景海峰 430

变动的光谱

——社会思潮研究视野中的现代新儒学 高瑞泉 445

从“儒学第三期发展”看儒学史的叙述与建构 干春松 457

早期启蒙说与儒学的当代发展 冯 琳 479

熊十力量论思想梳释 胡治洪 490

从冯友兰“宇宙底心”论“会思想的宇宙”

——兼与王庆节先生商榷 高予远 507

贺麟王安石研究中的心学思想 张学智 522

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

——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李明辉 536

为“新儒家”做注释：从徐复观与殷海光、钱穆的冲突说起 何卓恩 549

作为横跨中外和通达古今之中介的诠释学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反思 洪汉鼎 565

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方朝晖 589

“以身为本”与“大同主义”

- “家国天下”话语反思与“天下主义”观念批判 黄玉顺 604

您曾经感动过吗？

- 《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导言 王庆节 619

- 性心情的三维向度 罗安宪 632

- 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及其思考 罗传芳 651

- 论儒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作用 姜新艳 656

- 儒学文化的世俗化问题及其意义 张能为 662

“异议”的再议

- 近世东亚的“理学”与“气学” 林月惠 670

- 从倪德卫看西方的儒学研究 周炽成 710

-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任 军 722

- “以西释中”衡论 李承贵 732

- 现代儒学的使命与规模 李清良 773

- 新儒家哲学的动力学与类型论 沈享民 785

新人文主义

- 儒学未来发展的一路径 王 正 806

哲理与信仰

- 谈谈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李景林 817

- 儒家安身立命的意涵与当代的挑战 吴进安 835

- 儒家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 伟 翟澜杰 848

- 汤一介对儒学现代性的探索 杨 浩 860

汤一介“中国解释学”构想与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 方法论比较研究	柳 恒 875
---	---------

附 录

“儒学的历史叙述与当代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目录	888
------------------------------------	-----

道统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蔡方鹿

一、道统思想提出的理论针对性

道统思想是儒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道统思想可溯源于尧、舜、文王、周公等。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是后世儒家所追述的道统之源，被视为对尧舜王道之治的继承。道统思想的直接思想源头是孔孟仁义之道。《大学》、《中庸》、《易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论述被认为是对孔子之道的丰富，而儒家道统思想的正式提出是在唐代。儒家道统思想之所以提出，具有鲜明的理论针对性，即是对隋唐佛教思想的盛行，宗教冲击人文而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回应。

佛教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其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适应，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遂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居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对外来佛教文化，既批判排斥其与己不合的教旨教义，又以开放的精神，汲取和借鉴佛教文化的长处，从而丰富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佛教文化。儒、佛的相互排斥、影响与调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探讨其相互关系，是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化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尽管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具有调和、适应儒学的倾向，但佛教作为出世主义的外来宗教，与入世主义的世俗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分歧。这些差异和矛盾引起了儒学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有时这种批判是相当严厉的。

儒、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儒佛两家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根本不同所引起。儒家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重视社会人生，讲个人对家庭、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

友等人伦关系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佛教在人生观上则认为，人生是苦海，并认为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的自身，生老病死是苦，有欲望而求之不得是苦，要摆脱痛苦，只有出世、出家，通过修习，进入涅槃境界，以得到解脱。由此，儒家以重人事、重现实，与佛教的重解脱、重来世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佛教思想的盛行，势必会冲击儒家伦理观念，危及儒家的理想社会结构，这引起了唐宋儒家学者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

李翱（772—841）指出：“佛法之流染于中国也，六百余年矣。始于汉，浸淫于魏晋宋之间，而澜漫于梁，萧氏遵奉之，以及于兹。盖后，汉氏无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①批判佛教传入中国后数百年间，以其夷狄之术乱中华礼仪，使得戎礼流行。

刘禹锡（772—842）对佛教的评价表明，唐中叶时佛教影响很大。他说：“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②佛法在九州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风足以化中夏之人。“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③儒学讲中道以管理众生，罕言心性天命之学，使得儒门冷淡萧条；而佛教则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解救苦难，使得在劫浊之世而佛教益尊。这不仅表现出儒佛两家理论的差异，而且也表明当时儒学衰息而佛教益尊的情势。可见佛教盛行对儒学的冲击之大。

柳宗元（773—819）既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又不排斥先秦诸子和佛教。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④认为佛、儒有相合之处而不可一概排斥。柳宗元看到佛教盛行于世，其徒众多。其言曰：“达摩乾乾，传佛语心。……告今天子，尚书既复，大行乃谏，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⑤从中可见，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唐代统治者宣扬，大行于天下，乃至“厥徒万亿”，在民间广泛流传。

韩愈（768—824）在佛教盛行、儒门冷淡的形势下提出了儒家道统论。他指出，圣人之道不传，使得佛老思想乘虚而入，并流行于天下，以致不讲

① 李翱：《去佛斋》，《李文公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刘禹锡：《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刘宾客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刘宾客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柳河东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仁义道德，其弊甚于杨朱、墨子。他说：“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①这实际上已把自己列入圣人之道传授的系列，决心使圣人之道经自己的努力得以流传下来，即使冒生命危险也万死无恨。这表明韩愈以身殉道的决心。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传道，有所谓历代相传、灯灯不灭的法统（法指佛法，法统指僧人学习佛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师徒传承关系）或祖师相传的祖统（意为祖师相承的统绪）。法统与祖统，或以法立名，或以人立名，名称虽异，实质则同。为了与佛教相抗衡，韩愈便以道统说反对法统说或祖统说，把发端于先秦的儒家圣人之道相传授受之说弘扬开来。这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韩愈的道统说的提出应是受到了其师梁肃（753—793）一定的影响。梁肃早归佛门，以天台宗湛然为师，曾述天台宗法统之传授。又师事独孤及，成为古文运动先驱。其作古文，尚古朴，为韩愈所师法。贞元八年（792），梁肃协助陆贽主试，推举韩愈登进士第。韩愈辟佛学，当受到了佛教法统说传授形式之启发，而提出相应的道统说加以抗衡。

虽然道统思想的源头在先秦、孔孟及汉代儒家思想里已经提到，但未成系统，没有明确提出，其理论针对性也不明显。至唐代儒学发展停滞，佛老冲击儒学，动摇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旧儒学墨守师说，严守家法，“疏不破注”，拘于训诂，限于名物与词赋，已经僵化，不能与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韩愈等唐代儒家学者及后来宋初孙复、石介等儒家学者力转此风，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家伦理扫地而造成的人无廉耻、纲常失序及社会动荡的局面，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对抗佛教宗派传道的法统，明确提出了儒家圣人之道传授的系统，并详尽论述道统之道的内涵。韩愈著《原道》一文，标志着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这在儒学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道统论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并非所谓韩愈等人为

^① 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地编造。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就十分重视仁义之道的弘扬与传衍，历叙圣人相传共守之道。经秦火之后，汉儒仍重视仁义之道的传授和确立，董仲舒、扬雄莫不如此。至隋代王通，以及唐代的柳冕等，均重视儒家圣人之道之传授，认为儒家圣人之道与佛老思想此消则彼长，形成对立。柳冕并积极提倡文章本于教化，视尧、舜、周、孔为文学的正统，下传孟、荀、董仲舒，建立以道统为主的文学观。柳冕的思想为韩愈所继承，韩愈强调为文志在古道，指出：“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①把文作为载道的工具，文章为传道而作。虽然韩愈没有说过“文以载道”四个字，但“文以载道”却是他的思想所指，他说：“盖学以为道，文以为理耳。”^②后来周敦颐明确提出“文所以载道”^③的文字，便是对韩愈思想的继承。从以上可见，韩愈道统论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历史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主观的臆说，或人为的编造。

韩愈指出，儒家圣人之道之传授由来已久，这区别于佛教、道教的所谓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④韩愈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明确提出了儒家圣人之道之传授系统。认为自孟子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儒家圣人之道失传。荀子和扬雄，由于“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未能完全担当传道的重任。于是“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今泯泯也”^⑤。韩愈分析了儒家圣人之道失传的原因，秦灭先王之法，焚书坑儒，使天下大乱。其后汉代虽解除挟书之律，寻求佚经，但经典已残缺，汉儒又不能全面地掌握先王之道，而

① 韩愈：《上宰相书》，《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韩愈：《送陈彤秀才书》，《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周敦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周敦颐全书》卷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④ 韩愈：《原道》，《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是各守师法、家法，使得圣人之道大坏，至今学者泯泯不可寻求。

韩愈所谓道统即道的传授系统，道统与道的关系，道统是形式，道是内容，道统为道的传授而设，无道则无所谓道统。那么，韩愈道统之道是什么呢？他对道统之道的内涵作了如下规定：《原道》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指出道由仁义构成，德是自得其道。道与德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故称之为“虚位”。而仁义则是儒家特有的道德，所以称为“定名”。这说明道不能脱离仁义而存在，否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成为佛老之道了。对此，韩愈强调：“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①指出是否讲仁义，是区别儒家之道与道家老子之道的界限。以仁义为道，这是儒家道统之道最本质的特征。自孔子提出仁礼之道，孟子把仁、义连用，提出仁义之道以来，仁义便成为儒家之道最核心、最基本的内涵。尽管在道统发展史上，道的内涵不断丰富，有阴阳、中庸、心、性、理、气、良知等多种含义，但仁义作为道的内涵，却是儒学各家各派所共有，舍仁义而论道，便不是儒家圣人之道，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韩愈为对抗佛老之道而提出的道统之道，是一种伦理型的道论，目的是为了突出儒家的仁义思想，以抗衡佛老不讲儒家伦理、去仁义的佛老之道。这一思想为理学家所继承，成为理学的思想渊源之一。

二、宋明时期提出道统思想的主要人物和观点

韩愈的道统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舍此则儒家圣人之道道的传授系统便不完整。尽管程朱等理学家未能充分肯定韩愈在传授儒家圣人之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也不完全抹煞），但不可否认程朱的道统思想受到了韩愈思想的深刻影响。对此，程朱也有承认。理学的道统论在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大的发展。从内容上看，韩愈道统之道的内涵是仁义，理学道统之道其基本的内容亦是仁义，不过在仁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天理、中庸等内容，把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结合起来，这是对韩愈伦理型道统论的发

^① 韩愈：《原道》，《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